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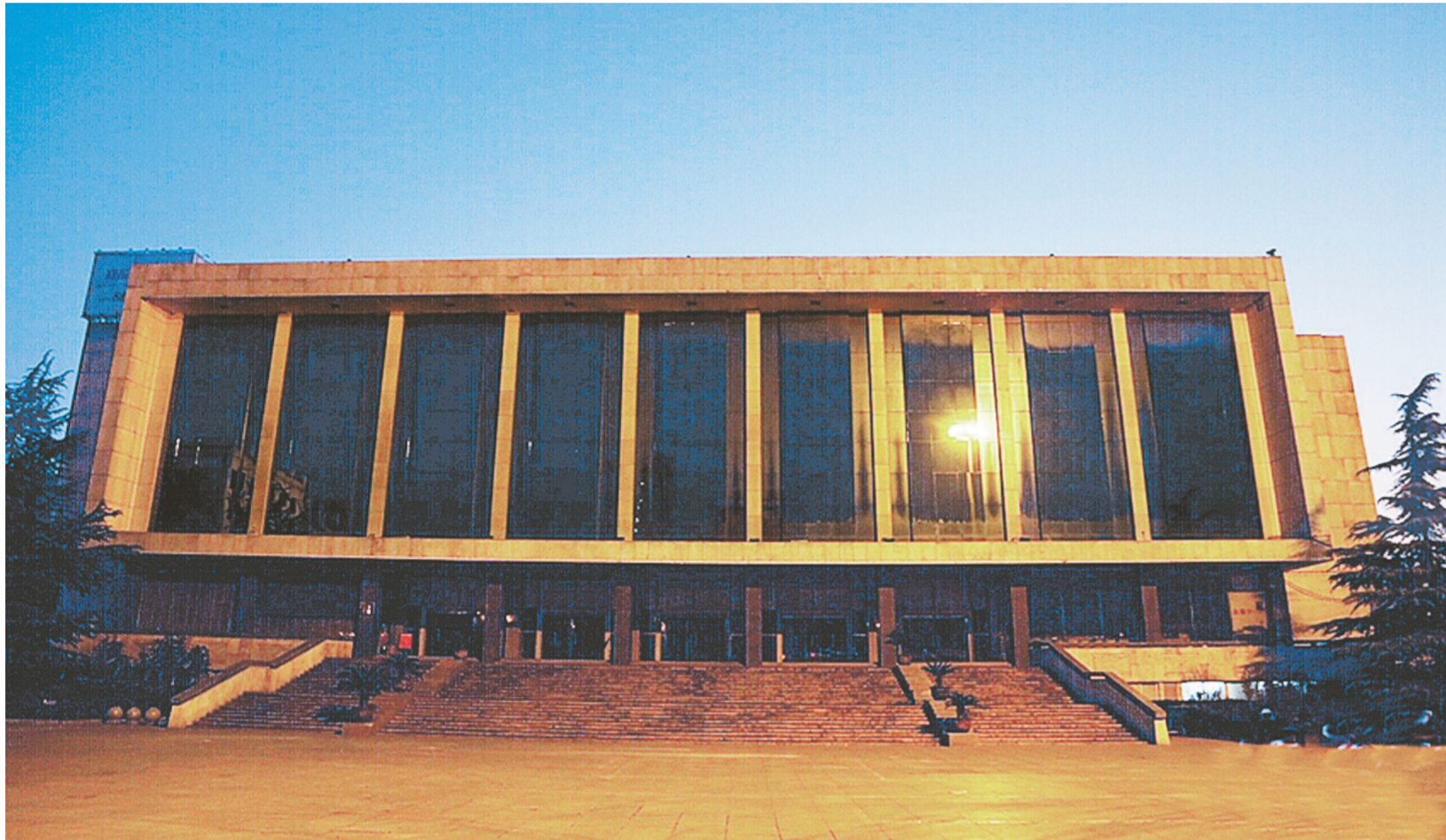
明净大方

庄严肃穆、明净大方 的 河南省人民会堂

12月2日凌晨5点,随着最后一块违法广告牌被拆解完毕,这场拆除河南省人民会堂“违法户外广告牌的“创文”保卫战尘埃落定,河南省人民会堂终于摆脱束缚,干干净净示人,恢复了往日的庄严、肃穆!



去“斑”后的省人民会堂



庄严肃穆



违法广告拆除前的省人民会堂

ZHENGZHOU DAILY 新闻时评

文明在心,才能安全出行

昨天是“全国交通安全日”。每年“全国交通安全日”,都会有一个活动主题。今年的主题是“抵制七类违法,安全文明出行”,所谓“七类违法”,指的是超速、超载、酒驾、毒驾、闯红灯、占用应急车道、不礼让斑马线。这段时间,公安交管部门正在针对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

严查之下,交通违法行为和交通陋习大概会收敛一些,但保持长效,让文明出行成为每一个人的自觉选择,才是我们真正期盼看到的。处罚是手段,安全是目的。提高违法成本,是为了让人对违法的后果有所忌惮,从而做出遵守法规才最有利于自己的“理性”选择。然而,要提升道路安全系数,仅靠严查是不够的,关键还是每个人都提升

遵守规则、文明出行的“自律”意识。其实,严查也是一种以“他律”来促使“自律”的手段。

“自律”一开始往往是痛苦的,因为要约束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习惯,如果在形成“自律”的过程中遭遇“他律”,还可能产生抵触情绪。然而,一旦“自律”形成,并把遵守规则、文明出行的意识外化为行动,自己和其他人就会拥有一个更安全的环境。一个无视规则的道路环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危机丛生,行驶或行走在这样的环境中,往往心生焦虑,看似自由,实际上是最大的不自由;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自觉遵守法、文明礼让的道路环境,才能让人感受到更多的安全与从容,看似不自由,实际上是有了更多的自由。

比如,在道路使用上,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本应各行其道,但行人行走在机动车道上,非机动车穿梭于机动车流中,机动车占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的情形,并不少见。这是自由吗?当然不是。不仅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遭遇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而且增加了人与人之间产生摩擦乃至冲突的可能性,社会氛围恶化,戾气积聚。

2011年,公安部最初设立“交通安全日”时,相关负责人就提供了一组数据:近年来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每年都在7万左右,受伤人数约30万,直接经济损失近10亿元。现在,全国机动车超过2.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数量已近3亿,公路交通里程达到435

万公里,驾驶人数量世界第一,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世界第一,机动车增长速度世界第一。我国已经快速进入汽车社会,如果汽车文明、道路文明程度不能同步提升,其中的安全隐患可想而知。

道路安全文明,人人都有一份责任。如果只要求他人尽责,对自己“宽容”,就很难看到进步;不如从自己做起,点滴力量才能累积成巨大改变。我们常说“小手拉大手”,孩子的规则意识反而比大人强,这难道不令成年人汗颜吗?诚然,道路规划、交通执法永远都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而每个人都尽到自己的那份责任,才是道路安全文明的基石。

纪玉

别让“标准答案”扼杀了创新人才

关心中国教育的人,对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并不陌生: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时至今日,这恐怕也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走入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成为发展的驱动力。李克强总理曾提出“万众创新”理念,呼吁通过创新为中国经济升级版发力。学校以培养杰出人才为己任,说得再明确一点,就是应该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掌握创新能力的人才。以此观之,我们的教育体系虽然培养出了不少学霸、学神,但总体来看学生的创新能力仍然是一大短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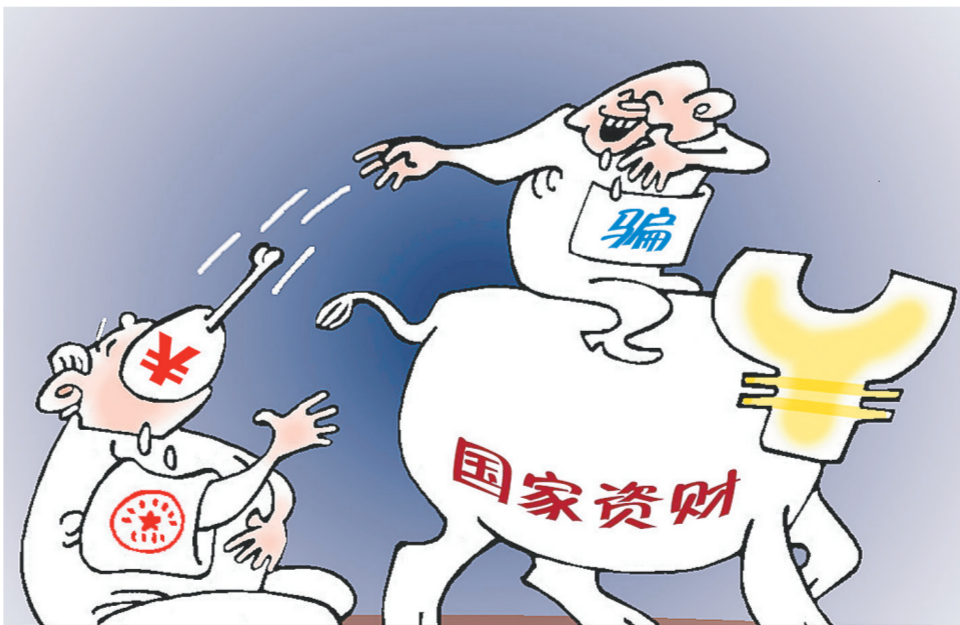
从教育模式上来说,每一个“过来人”都曾体会“中国式教育”的弊端,那就是强调唯一的“标准答案”,学习的过程被简化为从黑板上抄到笔记本上,再从笔记本上抄到考卷上的应试过程。当然,在这种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学生基本功不可谓不扎实,但创新能力的缺失却得不偿失。从儿童时期开始,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非黑即白”:只有标准答案是对的,其他答案都是不对的,只需要记住正确答案就行,没必要去思考还有没有其他答案。这种价值观念潜移默化,使得学生只求不出错,却缺乏追求新求变的意愿。长此以往,除了被动接受“标准答案”,学生不敢尝试新事物,更谈不上创新。

而从社会环境上来看,一方面我们的文化传统更倾向于社会成员做一个守规则的、按照常理出牌的人。大多数人的成长都是按照千篇一律的路径:升学、高考、上大学、找工作……只有遵循此道,才算是“正路”,而辍学、创业等另辟蹊径之举,往往被视作“不务正业”。另一方面,社会竞争往往还存在着学历崇拜、文凭情节。前不久,深圳一家企业招聘应届硕士生,开出了“普通院校5000元、重点院校6000元、清华北大9000元”的薪酬……只看学历不看能力的畸形人才观下,如何鼓励学生把精力用在搞创新上而不是混文凭上?

归根结底,要让教育从应试教育转到鼓励创新的轨道上来,首先要摒弃以往那种片面强调标准答案的观念,鼓励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还应鼓励学生在标准答案之外寻找其他可能的正确答案。唯此,才能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怀疑精神。

其次,是要改变人才选拔和高校评价的指标体系。随着自主招生等新渠道逐步拓宽,素质教育理念渐受认可,大学招生也应给创新型人才开“绿灯”。再次,高校的学术评价,应从单以论文数量论英雄,过渡到产学研结合,鼓励创新创业上来。比如近日清华大学就宣布,将在明年开设创业辅修学位,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

张涨



何以能“小投入大产出”?

《现代金报》报道,杭州铁路及东枢纽工程拆迁中,被拆迁方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兵多次请工程征迁指挥部工作人员盖章吃饭,并送给价值近3万元的财物,骗得该工程多支付拆迁补偿共计5560余万元,以及至案发时尚未付清的25套拆迁安置房(价值1380万余元)。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吴兵无期徒刑,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并判处吴兵有期徒刑十年。

只不过请吃几次饭,塞了3万元行贿,居然骗得了国家工程的拆迁补偿六七千万元,这笔“买卖”,产出竟是投入的数千倍。要论官商勾结中的暗箱操作权钱交易,此事堪作典型案例了。

吴之如 文/画

国考“降温说”言之尚早

2015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录用考试公共科目笔试11月30日结束。一年一度的“国考”,再次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同时也让很多人趋之若鹜。但与往年相比,今年国考在招录人数增加的同时,却出现了考生人数下降的“逆现象”,不少人据此得出“国考降温”的结论。

统计数据来看,和2011年的133.7:1、2012年的117.7:1、2013年的107.2:1、2014年的71.9:1相比,今年国考的竞争比,即平均每招录一个人背后的竞争者数量已经降至64:1。同时,今年超过2000:1的高竞争比职位只有3个,比去年减少了7个。如果单从竞争比等数据来分析,今年国考确实处于5年来的最低值。然而,这能说明国考已经“降温”了吗?假如国考已经“降温”,相关数据必然随之下降,但反过来推理就不必然成立了。原因很简单,数据减少是许多因素促成的,不一定是公务员岗位吸引力下降,也可能是“吸引力”还在,门槛却在提高。换句话说,不是“不想”报考,只是“不能”报考。

近些年,国家加大了公务员招录改革力度,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格要求更加详细,更加突出基层工作经历;二是职位设置更加科学合理,更加向边远地区、基层岗位倾斜。在我看来,这才是国考人数减少的最重要原因。事实也证明,但凡竞争比低或者无人问津的岗位,要么是资格要求比较高,要么是边远地区条件艰苦。从2010年开始,国考要求有基层工作经历者所占比例逐年提高,而且专业限制也越来越严格,门槛的提高自然会使得不少人望而却步,由此带来竞争激烈程度下降也在所难免。与此同时,边远地区、基层岗位所占比例也在逐年提高,今年更超过了76%,一些基层岗位还明确标注了工作条件艰苦、经常出差、需值夜班等工作特点,这或许就是许多岗位无人问津的原因所在。

目前来看,国考所谓“降温说”言之尚早。因为报考人数下降,很大程度上不是主观原因,而是客观上的门槛提高和岗位减少所造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国考热”有一定的社会合理性,对于个人而言,也多是基于理性选择。公务员作为一种职业,必须承认并不是人人都抱着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去的,也不是为了追求隐性福利和灰色利益去的,因此,所谓“八项规定、反腐致致考生人数减少”的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公务员这一职业具有其他职业无可比拟的优势,比方说中等偏上的收入保证、稳定的福利保障、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个人基于此选择报考公务员,正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对于人才流动来说,却难言理性。倘若社会精英都将加入公务员队伍作为职业优先选项,势必会减少更多优秀人才流向生产行业、创新行业,更能做大财富蛋糕的行业。

“降温”是国考改革的既定方向,从中央到地方也一直在加速这种转变,现在通过门槛设置带来的报名人数变化,还不能为“降温说”提供充分佐证,因为最根本的原因——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以笔者愚见,要使国考真正“降温”必须在两个方面加速改变:一是对公务员岗位“去优势”,降低吸引力;二是对社会其他岗位“添优势”,增强吸引力。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当其他岗位“升温”了,公务员岗位必然会“降温”。

丁建庭